

明清史
研究丛书

近代的初曙：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翔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高翔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明清史研究丛书）

ISBN 7-80149-379-6

I. 近... II. 高...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18 世纪
IV. K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2489 号

·明清史研究丛书·

近代的初曙：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著 者：高 翔

责任编辑：默明哲 雁 声

责任校对：闫晓琦 同 文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 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20.25

字 数：495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79-6/K·037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陈祖武

副主编：高 翔 杨 珍 万 明

编 委：

万 明 王天有 朱诚如

李治亭 陈祖武 张杰夫

汪学群 杨 珍 高 翔

栾成显 黄燕生

该书堪称关于 18 世纪中国乃至整个清代观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迭出的开拓创新之作。该书从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照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示了 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画卷。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拓宽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使该书有关 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及其时代精神的结论更加可靠，对所谓 18 世纪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否定更加有力。

——赫治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以大量材料证明：18 世纪的中国社会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从而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说、静止说，特别是否定了国内外学术界仍流行的 18 世纪有考据无（或少）思想的说法。

——王思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高翔作《18 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正好填补了这一长达数十年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作者的全新的观念、广阔的视野，全方位地对准了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从其观念变迁来揭示 18 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探寻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因。如作者坦言：本书不是学术史，也不是思想史，而是一部关于清代中国 18 世纪观念文化史的著作。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

径，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这同样适用于全部中国通史的研究，故本书之作，是一个范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考察 18 世纪中国学术的重大变革，认为是汉学之兴和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学风和经典著作的批判，形成汉学与理学并存的局面，但汉学显然已取得主流学术地位，而在其内部已形成了多元化的趋势，诸如“以礼代理”、反科举倾向、信仰多元化、经世思潮、西学观的出现等等，异彩纷呈，并驱争先。作者论证清代知识分子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仍然提出了政治上的新观念：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怀疑与批判，提出新的行政管理的理论、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民族意识、反清潜流等。所有这些新观念，便构成了清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作者做了精辟的概括，这就是：17 世纪为经世、18 世纪为求实、19 世纪为变革。

——李治亭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对 18 世纪中国知识界所处的历史环境，即所继承的 17 世纪的精神遗产和社会关系做了概略的考察，对构成 18 世纪社会精神风貌的伦理观念、学术观念、政治观念等基本问题做了着重的介绍和深入的概括，对 18 世纪以后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合理的剖析，实际上以 18 世纪为重点，刻划了清代观念文化发展全过程的轨迹，揭示了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观点鲜明、新颖，颇多发明，颇多创见。读其印稿，感觉别开生面，堪称近年少见的佳作，令人惊喜。

——何龄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高翔同志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一些老问题。所谓新视角，即从观念变迁的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搜集资料，深入分析了 18 世纪（不限于 18 世纪）一批文化人的观念，包括伦理、道德、法律、情欲、异端等等观念形态的变迁，发掘出以前未被重视的思想火花。作者对这些思想火花，作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

这个新视角，以及由这个新视角阐发的新见解，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的兴趣。

——王戎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础研究课题，
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明清史研究丛书》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研究，是在著名史学家杨向奎、王毓铨二位先生的率领之下，由众多老一辈学者奠定基础的。45年来，他们甘贫甘淡，孜孜耕耘，这块园地已是枝叶扶疏，满园姹紫嫣红。从《乾隆朝刑科题本》、《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开始，《中国史稿》明清史分册、《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明史研究论丛》、《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辑刊相继问世，从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群体优势。如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也由于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业已陆续退出研究工作第一线。然而，十分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正成长起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风严谨，锐意进取，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本所明清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今年春天，本所明清史研究室的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倡议，编纂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此一想法一经提出，即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谢寿光同志的支持。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划，精心组稿，适逢高翔博士、宋军博士和万明教授的三部研究成果竣稿，于是丛书的出版便提上日程。据知，继高、宋、万三位同仁的大著之后，明清史研究室诸位同仁都将陆续在丛书中推出新作。

明清史料浩若烟海，明清史研究亦有甚多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和课题，在繁荣历史科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明清史研究者大有可为。我们希望在本书中，他日能不断刊出四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借此机会，我们谨向海内外明清史学界的诸位先进呼吁，恳请各位对本丛书的编纂出版，予以指导、支持和帮助。如蒙颁赐力作，编委会全体同仁当感激不尽。

祖武不学，无非较之诸位俊彦马齿虚长，即承他们不弃，忝任丛书主编，得以一附骥尾。其实徒具虚名，大量的工作皆是编委会诸位同仁做的。祖武唯愿竭尽绵薄，同诸位同仁一道，把这部丛书编好。

陈祖武 谨识

一九九九年九月廿三日

目 录

导 论：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1
第一章 时代与问题	11
第一节 17 世纪的精神遗产	11
第二节 盛世与观念	31
第三节 文治与士人	51
第二章 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94
第一节 戴震与理欲之争	95
第二节 袁枚的性情说及其伦理观	129
第三节 普遍伦理观念之变革	161
第四节 生活方式的变迁	189
第三章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	218
第一节 汉学兴起及其反理学倾向	219
第二节 独立思考与对主流学术的批判	264
第三节 主流学术内部的变革	287
第四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上）	318

第五节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下）	369
第四章 政治观念的变革	425
第一节 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	427
第二节 冲击禁区：对极端君主专制的 怀疑与批判	453
第三节 汪辉祖的行政管理理论	490
第四节 普遍行政管理观念	503
第五节 危机意识、民族意识与反清潜流	526
第五章 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	542
第一节 时代精神	542
第二节 经世变革思潮的崛起	547
第三节 社会发展	578
结 论	611
附录一：主要参考书目	613
附录二：关于本书的一封信	622
后 记	629

第三章 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

学术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水平。与传统社会的空前繁荣相适应，18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也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兴盛局面，即所谓“文治极盛，朝士多以学术相尚，宏奖为怀”^①。其时之学术，倡扬独立思考，讲求严谨求实，具有显而易见的宏博和实证特征。所谓宏博者，指的是这个时期的学术不但气象宏伟，涉猎广泛，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形态上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多元化趋势；所谓实证者，指的是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破除了宋明以来浮躁、空泛之习气，研究者往往能够钩深致远，厚积薄发，不事空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8 世纪的中国学术，从总的情况看，以理学和汉学为其两大主流，在两大主流学术之外，游移着众多的其他学术流派，存在着丰富的，与主流学术不同，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学术观念和思想。当然，考察一个时代之学术演变，自当以主流学术为其入手处。而当时中国学术观念之变迁，也始终以两大主流学术为轴心（不可否认，这两大轴心彼此有重合之处），向人文学术其他领域辐射和扩散。其时之学术命题，学术规范，学术兴趣，无不与理学和汉学之盛衰沉浮，以及与它们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密不可分。忽略这一基本事实，单纯就考据论考据，就学派论学派，很可能会对许多问题得出偏颇的结论。让我们先从汉

^① 徐世昌：《兰泉学案序》，《清儒学案小传》卷九。

学的兴起谈起，因为这不但是清代学术，而且也是清代观念演变的关键性事件。

第一节 汉学兴起及其反理学倾向

大凡论学术者，当首重源流，再论分野。梁启超论清代学术，云：“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①梁启超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准确。如从学术演变之实际看，清代学术“卓然成一潮流”者，顺康之际程朱理学的复兴理所当然应居其首，其次才为汉学和今文经学。如果没有清初理学的兴盛，没有因理学兴盛而引发的学术争论，没有理学复兴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可能就没有乾嘉汉学的兴起。钱穆在谈及清代学术发展时，曾发表过下面一段议论：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州、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说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自序》，《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

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①

钱穆说“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显然有些过头。虽说汉学诸家自称治学以穷义理为宗旨，虽说理学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汉学家的考据和判断，但汉学毕竟属于另一学术流派，它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规范，汉学家所谓之义理，也未必就是宋儒之所谓天理，汉学家成就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治学实践，尤其取决于他是否能突破宋学的条条框框，以求实之精神，以实证之手段，不囿陈说，独抒己见。故其成就之大小，和其宋学之修养，不存在必然联系。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钱穆说“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却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明清时期，宋学在意识形态中始终居于支配地位（只是到 18 世纪中叶以后，学术界才逐渐进入汉宋并存时代，但这并不能改变理学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理学的基本观念、学术范畴已经深入人心。治学者，欲穷究天理，阐扬性道，自必熟读宋儒之书，沿其开辟之途径，深入讲求。即欲自开生面，自竖旗帜者，亦必先破宋儒之陈说，方可张扬自家主张。什么叫学术垄断？什么叫主流学术，只要看看明清时期理学的地位就知道了。而清代汉学兴起本身，既可以说是宋学发展的特殊产物，也可以说是对理学学术垄断的反动。

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寻，研究者将某种学术现象完全归结于社会、尤其是政治作用的结果（如将汉学的兴起一味归结于清朝文化专制主义，归结为文字狱的盛行，等），实际上是将历史过程简单化了。清代汉学的兴起，当然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比如：康乾盛世时期充裕的财力和物力，生活水平的提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1 页，第 1 章，《引论》，商务印书馆，1997。

高，使学者有可能安心从事文化和历史的考据工作，从而推动学术沿考据一途发展^①；政府不断发起的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特别是大量有关古代典籍的文化项目，推动着学术界将注意力集中到经史典籍的整理上；与此同时，清朝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字狱的增加，也促使一些学者远离现实，加入考据行列，使考据风气更盛，等等。但需要学者更加重视的是：宋明以来学术发展本身，已经显示出以考据、训诂为重要特征的汉学的兴起具有客观必然性。原因很简单，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观念上的纷争（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等），最终必定都要落实到对儒家经典的认识和理解上，而要准确理解先儒经典，就必须借助考据、训诂等小学手段，就必须充分重视，认真参考生活时代离古代较近，而经学素养相对比较精湛的汉儒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而当学术走到这一步，汉学的出现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正如笔者在第一章已经指出的，讲究学术严谨在 17 世纪后期已经成为知识界的重要风气，尤其是一些涵养深厚的理学名家，已经感觉到了理学空谈之弊端，开始注重小学对理解儒家经典之重要性。陈廷敬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冬（公元 1638 年），卒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字子端，号说岩、午亭，山西泽州（今山西晋城）人。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进士，从此进入仕途，后积官至大学士。陈廷敬为清初著名理学家，为学师法河津（薛瑄），然他对晚明以来，守陋自是，“慢弃圣言，割裂传注”的轻浮学风深恶痛绝，尤其反对束缚思想自由，限制学者视野的时文，认为时文是败坏经学的罪魁祸首。他说：“经学之弊，原

①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以考据名乾嘉汉学是准确的，但考据毕竟是乾嘉汉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和理学在治学方法上最重要的区别所在，因此将乾嘉汉学称为考据学未尝不可，何况这种称呼由来已久！

于时文。昔者经义之兴，本以论断为主体，不执一说，引据经传。非如后之描画声口，簧鼓吻唇，乳儿小生，侮圣言而代为之词，势不得不单守一家之诂训，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恶烂，不逾时历岁，改头换面，以趋新巧，使学者穷年积月从事于无用之空言，考其实枵然无所得也。又何有于经学哉？”陈廷敬提出：治经学应以注疏为主，但要旁通它说，以己意反复辩论，以求至当。他指出，对清廷来说，“欲正经学之失，须革时文之弊。时文之弊革，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之说，以求得乎圣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于无用之空言，而国家收实学之效也”。应该说，陈廷敬这种反对时文，强调治经要旁通诸家之说，而不要专主一家的思想，在清初正统理学家中是难能可贵的^①。

与强调治经要博通诸家之说相适应，陈廷敬为学虽师法河津，但又不拘于河津，他讲复性，但更提倡率性。复性者，即恢复本性，唐李翱即有此说，降至薛瑄，复性之说更盛。而率性者，尤言依乎本性，语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②陈廷敬认为率性较复性更能体现儒家道德修养的真实涵义。他说：“薛敬轩以复性为宗，复性二字亦是统论话头，未若子思率性较真切。”又云：“敬轩能率性者，故修己教人以复性为说。”^③陈廷敬对《中庸》开篇关于性、道、教的三句概括推崇备至，认为此三句是“子思一生大本领，圣学大源头”，故《中庸》“首揭以示人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④。在心性论上，陈廷敬首重率性，表明他在治学上更加注重先儒经典的本意，而不是简单追随后人的学术阐发，这一严谨态度，即使不是

① 《陈廷敬》，《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六。

② 《中庸》。

③ 《杂著·困学绪言若干则》，《午亭文编》卷二十四。

④ 《杂著·困学绪言若干则》，《午亭文编》卷二十四。

体现，至少也预示着清代学术变迁的新方向。

要探寻先儒经典之本意，就必须承认小学对儒学发展之重要贡献。陈廷敬尝谓“小学之为功于经书甚巨”，提出研究者应重视对经书字义的考察，“为此以昭后学，亦小学之功也”^①。对汉儒说经在学术上的独特价值，陈廷敬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秦烧书坑儒，经佚矣。汉兴于残烟断烬之余，掇拾其什一二。其时专门名家，引经制事，虽守残抱阙，彬彬乎有近古之风焉。”^②他对东汉经学家郑玄十分推崇。云：“尝见汉以来儒者，如康成之卓然行修，终始不渝，非扬雄、刘向之徒所得并论。况其博研经籍，殚精圣道，虽仲舒之贤，犹当避其淹恰焉，又岂马融、何休诸人所能仿佛者哉！”^③

与陈廷敬同时代的理学家李光地虽对一些考据学家否定理学经典的做法深恶痛绝，但对形声诂训本身不但亲自参究，而且对这一学术还相当支持。他说：

今之学者，大抵搜华撷卉为文辞之用而已，至于字义、故实、书文、形声，尚未有留意讲考于其间者。若大者为遗经源流，礼典同异；细而地名、山川、史载人物真贋是非之迹，则岂徒以朴学置之，抑其恶陋就简，而自恬于伪陋？呜呼！文武之道，岂有小大哉？万一朝廷举行石渠之典，吾知众籍罗凑，而莫之措辞，儒者之羞，非云小缺。^④

陈廷敬、李光地对小学的态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

① 陈廷敬：《四书字画约序》，《午亭文编》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

② 《经义考序》，《午亭文编》卷三十五。

③ 《史评·郑康成》，《午亭文编》卷三十四。

④ 李光地：《閤百诗小传》，《榕村集》卷三十三，《四库全书》本。